

歷史與空間

文：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許競思

傳播與翻譯

——談近代中日詞彙交流史



沈國威教授。

中國和日本在新漢字詞的創造以及圍繞這些新詞展開的語言接觸和詞彙交流是促成十九世紀以降現代漢語詞彙體系形成的重要一環。日本關西大學外語學部教授、東西學術研究所研究員沈國威教授早前到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作演講，便簡介了近代中日詞彙交流的歷史及其影響。

現代漢語詞彙體系

地域上，「東亞漢字文化圈」包括了中國大陸、日本、韓國、台灣、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等有使用漢字的國家及地區。而雖然越南現在已不再使用漢語了，但越語中的漢音詞仍佔詞彙總數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可見漢字其廣泛的影響力。

在這個「東亞漢字文化圈」之下，不同的漢語詞彙得到交流，便慢慢形成了一個由傳統詞、外來詞及自創新詞三方面組成的體系。「傳統詞」是指來源本為經典、宗教、文學等的生活用語及抽象詞彙，是支撐整個體系的重要部分。「外來詞」則主要用以表達西方傳來的新概念，以借音詞、借形

詞、直譯詞及激活詞為主；當中，激活詞本在漢語中也有，但卻在日本的影響下而演化成另一種意思，「料理」及「人妻」便是其中的例子。而「自創新詞」顧名思義，便是指詞形及詞義均為全新的詞彙。

在現代漢語外來詞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來自日語的詞，又稱為「日語借詞」。「日語借詞」是在西學東漸的背景下應運而生，多用作表達從西方傳來的抽象概念或產品，例如：「哲學」、「革命」、「電話」等。深入探討日語借詞不僅切合外語教學、漢語詞彙至漢語本體研究的需要，更關乎整個東亞近代化的過程演進，有助我們掌握更多與現在的政府及文化有關的歷史。

「日語借詞」可再被分為「日語固有詞」及「新漢語」。前者也稱「和語」，即來源自古日語的詞；後者即指江戶時代以來的漢字詞，也就是日本人接受西方新概念後自行創制的新詞及譯詞。「新漢語」大多使用漢字，包括了音譯詞（「瓦斯」、「侏羅紀」）、摹借詞（即直譯的詞語：「盲腸」、「蒙膜」）及意譯詞（「神經」、「悲劇」、「客觀」）。這些「和製漢語」在構詞、理據上都與中國典籍有着不可分割的關係，而尋找並重現這種關係，正正是日語借詞研究中一個重要部分。

中日詞彙的「共創」與「共享」

中國和日本在詞彙上的交流最早可追溯到十七至十八世紀。其時正值西方的航海年代，大批耶穌會士東來傳教，並在華從事翻譯工作。他們主要翻譯中國的古典、佛經、善書及部分西方典籍。利瑪竇為最早來華及成就最高的耶穌會士之一，他於1601年進入北京，後來並在中國士大夫徐光啟的幫助下翻譯了《幾何原本》的前六卷。因耶穌會士翻譯的典籍多與天文、地理、數學等科學有關，由此而來的詞新詞有：「基督」、「幾何」、「地球」、「望遠鏡」等。當時的日本採取閉關政策，限制西方進口及外國人入境，這些新詞因此只能透過中國傳至日本。

清末十九世紀時，新教的傳教士亦相繼來

華。馬禮遜於1807年進入廣州後，編纂並出版了中國第一部英華字典。1842年鴉片戰爭後，中國被迫開放大門，出版活動更趨活躍。新翻譯出來的詞語仍以在科學範圍之內的為主，包括「引力」、「化學」、「螺旋」等，而世界各國的地名大概也是在這時期翻出來的。在日本，明治初期是一個對漢學十分崇拜的年代，活躍於中國的日本漢學家有藤田豐八及古城貞吉等人，他們亦十分接受新教士翻譯的漢字新詞。

1895年的甲午戰爭是一重大的轉捩點，漢字詞彙的交流亦自始從日本反傳至中國。日本在甲午戰爭的勝利印證了明治維新的空前成功，引發中國人的日本留學潮；日本亦因此開展了其「黃金十年」（1900-1910），並大量翻譯西方書籍。十八世紀江戶時代的「蘭學」（經荷蘭人傳入的學說）得到明治革新者的繼承，為各學科準備了基本譯詞。他們在翻譯時亦盡量使用漢籍中的詞語，避免音譯詞。於是乎，在各方努力下，中國的古典詞在日本成為新譯詞（如「關係」、「衛生」）後竟又回流中國，部分在中國未能普及、由新傳教士翻譯的新詞在傳至日本後，亦在這段時期回流中國。日語借詞為當時漢語從文言文向白話文的過渡奠下了基礎，進一步發展了一批造詞的成分及造詞模式，並為各學科提供了連基本術語在內的數千個詞語，使我們可以通過書面或口頭的形式來談論現代的新知識。

結語

事實上，在現代漢語詞彙體系中，日本在漢語新詞的創造方面實不可沒。造詞本是個人行為，當中牽涉到時間、地點、造詞者、其方法及理據等問題；但一個新詞如何得到普及，並獲得語言社會的認同從而成為詞彙體系的一員，這個過程亦十分值得關注。漢字文化圈的國家和地區對漢字新詞這種跨地域性的接受及認同，其實也反映了近代東亞在文化上的交流與融合，為東亞研究中極其重要的一環。

（本文及圖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古典瞬間

文：鄧忠強

「繁文」受罰

有個「博士買驢」的成語典故說：「博士買驢，書券三紙，未有驢字。」（語出北齊·顏之推《顏氏家訓·勉學》）這位博士（學官）先生為人買驢寫契約，寫完三張紙，還沒見到「驢」字，可見他廢話連篇，不得要領，原以為可以自炫學問，結果遭人恥笑，落得一臉尷尬相。當然，這個「三紙無驢」只是民間笑話，我下面要講到的「繁文受杖」，卻是歷史上的真實故事。

據《明史·卷139》說，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十二月，刑部主事茹太素上了一道奏摺，「陳時務累萬言」，洋洋灑灑地寫了一萬多字。看到這密密麻麻的長篇奏文，明太祖朱元璋感到頭疼，便叫中書郎王敏讀給他聽。奏章中說：「有才幹的士人，幾年來倖存的一百個中沒有一二個，現在皇上信用的人，全是迂腐的儒生和平庸的官吏……」朱元璋耐性不佳，只覺滿紙空話，不著邊際，而且「言多忤觸」，於是龍顏大怒，不等摺子念完，叫來茹太素當面責問：你說的「迂儒俗吏」究竟何人？太素語塞，答不上來，太祖猶如火上澆油，當即令人「杖於朝」，當着滿朝文武，把茹太素的屁股打了幾十大板。

第二天，太祖氣消了，晚上又在宮中叫人讀茹太素的奏章。原來，這份奏摺長達17000字，寫到16500字之後才進入正題。臨尾，朱元璋才「得其可行者四事」，聽明白可以批准「照辦」的有四件事。對此，朱元璋感慨地說，茹太素所要匯報的事，500字足矣，奈何文字繁瑣冗長，使人難明其意！隨即下令：「虛詞失實，朕甚厭之。自今有以繁文出入朝廷者，罪之！」（《禮部志稿》）

這裡所謂「繁文」，指的是那種文字繁冗拉雜而又言之無物的政務公文。朱元璋明文規定，官員寫「繁文」者，將受罰治罪。但所用手段之嚴酷，實在讓人不敢恭維。「白刃不相饒」，棒打不留情——以此來懲治犯了「繁文症」的人，未免太過殘忍。

然而，撇開朱元璋的「嚴刑猛政」不論，單就其反對「繁文」空談，主張直言

務實的觀點來看，卻有可取之處。對「繁文」之弊，他說了一句堪稱「經典」的話：「文詞太多，便至繁聽。」一篇文章堆砌詞太多，就會繁瑣繞口，擾得人聽不明白。上書言事，屬於應用文之類，更要講究言簡意明，實話實說。朱元璋雖是一個粗人，他的見解倒頗得作文之要。可敬茹太素本是位直臣，可這次卻不直言其事，就像「博士買驢」一樣，偏要曲意繞彎子，放空炮，結果弄巧成拙，屁股遭打，你說他冤是不冤？

時下也有人得了「繁文病」，喜歡寫長而空的文章，雖然不會像茹太素那樣挨板子，但也請不妨反省一二：寫文章的目的，是要別人接受自己的觀點，為什麼一定要寫得那麼長，又那麼空空洞洞的呢？沒有什麼實際內容，硬要裝腔作勢，故作高深，長篇大論，誇誇其談，轉彎抹角，東拉西扯，雲遮霧罩，言不由衷，莫非存心不讓人看？誠如多年前毛澤東批評的，這樣的「八股調」，「有譁眾取寵之心，無實事求是之意」，就像「那些又長又臭的懶婆娘的裹腳布」，使人聞之生厭，望而生畏，只得「趕快扔到垃圾桶裡去」。華而不實的文章，即使文辭再漂亮，誰買你的眼呢？

其實，文以達為要，長或短，關鍵取決於內容和需要，當長則長，當短則短，可長可短的，也要盡量做到長話短說，以少勝多。文章長而空不好，短而空也不好，無論長短，都要言之有物。不過，寫好短文更不易。短文章要做到容量大，思想深刻，文字必須千錘百煉，精益求精，這是需要下苦功夫的。北宋歐陽修《醉翁亭記》，描寫滁州地理形勢，據說原寫了五百餘字的開頭，經過反覆修改和錘煉，最後用了五個字：「環滁皆山也」，何其明快又引人入勝！所以魯迅先生說：「寧可將可作小說的材料縮成速寫，決不將速寫的材料拉成小說。」

當然，不光寫文章要力戒臃腫奢華，講求簡潔樸實，講話開會也應作如是觀。如今文山會海氾濫成災，尤要精簡再精簡，提倡寫短文，說短話，開短會，切實改進我們的作風、學風和文風。

文藝天地

浮城誌

文：翁秀美

如水年華的最美倒影

手寫的書信，如春花夜開，冬日落雪，無聲之處勝有聲。信裡語言，真情流露，信裡心思，動人心弦。

寫信，是一件重要的事。寫什麼，怎麼寫，暗中思量；紙一鋪開，便是心在說話。

1934年初，沈從文因母病遷鄉，行前，向張兆和許約，每天寫信報告沿途見聞。他當真天天寫信，有時一天多達6封，信裡有對一路風景的描繪，所見所思和對家人的思念，而且隨信附了簡潔生動的素描，有桃源上面簡家溪的吊腳樓，桃源上五十里處的美景，乘坐的船艙一角，山水如畫，圖文並茂，收信人看時，心裡是多麼放心和熨帖。無獨有偶，魯迅先生在廈門任教時，寫信給廣州的許廣平，也在信裡畫出自己居住地和學校的工作環境圖。

方鴻漸第一次收到唐小姐的信，臨睡時看一遍，中夜醒來看一遍，關燈後想想信裡的話，又開燈再看一遍。分手時交還對方信件，唐小姐看到自己給他的七封信裝在夾心朱古力糖金紙匣子裡，封皮破了用玻璃紙襯補好，還寶貝一般收藏唐小姐的地址和電話號碼。這個《圍城》裡做什麼事都身不由己的人，和唐曉芙戀愛是真正用心了。

信裡心思轉轉折折，曲曲彎彎，小機關，大意思。古代妻子給丈夫寫信，信內附當歸一支，正是：「千言萬語從何說，惟有當歸歸寸心」。有外出者托人帶家書回，信封裡一張白紙，上面一字皆無。妻子起初吃驚，既而明白，寫道：「碧紗窗後啟緘封，盡紙從頭徹尾空。應是仙郎懷恨恨，憶人全在不言中。」此類家書，惟心有靈犀方能感應出其中的千言萬語。

有一個小故事，一個小伙子喜歡上一位姑娘，不好意思明說，便去一信，姑娘拆開一看，信封裡空空如也，她猜出男孩心思，便抓起一把信紙往塞進信封寄去。小伙接信後大喜，原來，空信封表示「沒有信心」，姑娘將信紙塞滿信封是要對方「充滿信心」，一來一往，成就好姻緣。

這幾天看《民國小學生作文》，其中的書信體尤為特別，雖是小學生，寫出來的信禮貌周到，言語樸實，觀察獨特，感情真摯，童心爛漫，想像豐富，有問候親人的，有勉勵學友的，有蜜蜂

給蝴蝶的信，還有寫給燕子的信，純真有趣。讀着我們的爺爺奶奶輩年少時的作文，並沒有遠處的時空距離，相反，感覺是那麼真實親切。

記得小學時，班上寫信成風，大家同住一村，天天見面，更有家隔一牆院牆者，前後不到十步遠，也寫信，貼上郵票寄來寄去。也許這就是信的魅力，把要說的話，放在信封裡起來，投進綠色郵筒，再由郵遞員送到對方面前，那感覺多美啊。信紙疊成各種形狀，開頭寫「見字如面」，結尾來個「紙短情長」，還文謔謔地寫道：好花不常開，好友不常來，只有常通信，友誼深似海。不過終究是孩子心性，玩得交頭接耳時，信件親密頻繁；吵架了，便用紅筆寫去一信，表示絕交，不久又和好，很有意思。小侄女上小學就給我寫信，字跡清細工整，寫了正面寫反面，受寵若驚的我回得也認真，打好草稿，再謄寫一遍。這樣的通信保持到她初中畢業。

信紙與信封，字跡與情感，成就了信件這樣一種傳情達意的文本載體和婉轉從容的交流方式。你寫的信，我收的信，跋山涉水，終於到了手裡，似遠又近，熟悉的字體裡，是長輩的叮嚀，戀人的深情，朋友的交心。厚厚的信札，保存了生命中親情、友情、愛情的珍貴印跡，讓陳舊發黃的記憶鮮艷明媚，散出瓣瓣馨香。

在電子閱讀逐漸覆蓋紙質閱讀，快速編制短信的現今，更加清晰地想念書信時代：窗前燈光下，坐着寫信人安靜的身影；路口花香中，立着等信人徘徊的身影，並諸多餘味不盡的機關設計與巧妙心思，種種美好情懷，串起無數封千姿百態的信，成為如水年華的最美倒影。



珍惜親情、友情、愛情。

網上圖片

遊蹤

文：劉蜀永

尋訪十九路軍遺跡

最近，應十九路軍淞滬抗日將屬廣州聯誼會會長、蔡廷鍇將軍長孫蔡醒民和羅定市政協副主席沈燦明邀請，我由香港前往廣州和羅定尋訪與十九路軍有關的遺跡。同行的還有十九路軍師長沈光漢將軍之子沈大中、處長葉少泉將軍之子葉耀南。

廣州紀行

我們尋訪的第一站是位於廣州市水陸路的十九路軍淞滬抗日陣亡將士陵園。1932年1月28日夜，日本海軍陸戰隊出兵進犯上海閘北，淞滬抗戰爆發。十九路軍以三萬之師，頑強抵抗武器精良的十萬日軍，激戰二十三天，經歷大小一百多次戰鬥，擊斃、擊傷日軍萬餘人，迫使日軍三易主帥，粉碎了日軍「四小時佔領上海」的狂言。十九路軍前身是粵軍第一師，該軍是一支廣東人組成的軍隊。淞滬抗戰可以說是廣東人為國家作出的傑出貢獻。

1933年，主要由華僑捐資在陵園現址建成十九路軍淞滬抗日陣亡將士墳園，抗日戰爭期間遭到日軍嚴重破壞。蔡醒民先生說，抗戰勝利後，他隨祖父到此拜祭時，當時園裡雜草叢生，先烈紀念碑周圍小販雲集。「文化大革命」期間陵園再次遭到破壞。改革開放後，情況才大為改觀。1981年廣州市成立十九路軍淞滬抗日陣亡將士陵園管理處。1989年，陵園被國務院列為第二批全國重點烈士紀念建築物保護單位。1991年，廣州市政府開始對陵園進行大規模修復和整治。1995年，陵園被民政部公布為全國第一批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十九路軍淞滬抗日陣亡將士陵園有凱旋門、先烈紀念碑、英烈題名碑、抗日亭、戰士墓、將士墓、先烈紀念館等七處紀念建築物，是一座富有古羅馬建築風格的陵園。陵園裡綠樹成蔭，道路整潔，建築物排列有序，營造出莊嚴肅穆的氣氛。

位於中軸線最北端的先烈紀念碑是陵園的主體和代表性建築。在巴洛克風格的半圓廊柱拱衛下，一座近20米高的花崗岩紀念碑高聳入雲。紀念碑下矗立着十九路軍無名戰士銅像，肩扛步槍，氣宇軒昂。這是廣州著名雕塑家尹積昌教授的作品。塑像前方排列着兩對銅獅、八隻銅鼎。這些雕塑暗喻「一·二八」淞滬抗日。蔡醒民先生說，紀念碑原來的雕塑在廣州淞滬後，被日軍拆毀熔化，用來製造武器。這些雕塑是1991年以後重新鑄造的。

紀念碑兩旁有將士墓和戰士墓。矗立在蔡廷鍇將軍題字的「淞滬抗日暨歷代革命陣亡將士公墓」前，不由我思緒萬千。經歷過戰爭洗禮和政治風雲的衝擊，這些為國捐軀的勇士們終於獲得了應有的尊重，他們的靈魂可以安息了。

羅定紀行

在高速公路上疾行三個小時之後，我們來到粵桂交界處的廣東歷史文化名城羅定。次日在羅定文史專家陳大遠陪



本文作者與蔡醒民先生（左）在陵園將士公墓前。

作者提供圖片

同下，從市區出發，乘車穿越收割後的稻田，我們來到羅鏡鎮龍岩村蔡廷鍇故居。這是一座磚木結構的粵西典型農家大屋，樸實無華。故居前有一座蔡廷鍇將軍戎裝策馬的石灣陶瓷巨型塑像，是十九路軍後人捐資塑造的。

蔡廷鍇將軍和蔣光鼐將軍是淞滬抗日的主要指揮官。1948年，蔡廷鍇與李濟深等人在香港發起組織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1949年後，他先後擔任過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國家體委副主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參觀蔡廷鍇故居過程中，蔡醒民先生對我說，祖父年輕時曾在家鄉做裁縫，了解民間疾苦。後來他在寶安縣做過警長，在搭船經香港返鄉途中，曾目睹外國人欺負中國人的情景。這些和他後來走上抗日反蔣的愛國之路不無關係。

我們還考察了與十九路軍有關的其他歷史建築，包括區壽年、沈光漢、葉少泉等三位將軍的故居。

區壽年故居仿西洋軍艦樣式建造，有地下室和八角形砲樓，與開平碉樓風格類似。故居前湖光山色，景色秀麗。葉少泉故居為四層洋樓，正門為三層雙柱陽台。李濟深、趙紫陽等曾先後在此留宿。解放戰爭期間，葉少泉曾將其借給粵中縱隊使用，作為十四團團部。但目前這兩座被列為羅定市文物保護單位的歷史建築未得到很好的利用。區壽年故居部分門窗墜落，圍牆破損，空置多年。葉少泉故居被當作堆積雜物的倉庫。

建議羅定市政府參考香港活化歷史建築的經驗，通過招標的方式，吸引有實力的社會熱心人士，活化和保護這些歷史建築。可在保留建築基本結構和原貌的前提下，將其用作文化活動場所、特色賓館等，並在其中舉辦小型展覽，介紹十九路軍歷史或其它地方歷史。一舉兩得，何樂而不為之？

（作者為嶺南大學榮譽教授、香港地方志辦公室副主任）